

書評：
《백제의 불교 수용과 전파百濟的佛教受用與傳播》

郭磊
(韓國)東國大學

一、引言

《백제의 불교 수용과 전파》譯成中文是“百濟的佛教受用與傳播”，此書是漢城百濟博物館在今年的四月份以“百濟的佛教受用和傳播”為主題，舉辦的第二十屆百濟學術會議的論文集。此次學術會議從佛教美術史、思想史、考古學的角度對百濟是如何從中國接受佛教，以及百濟佛教的傳播情況進行了綜合性的整理。考慮到中文學界對於韓國佛教的研究情況尚存留有許多空白，故在此不揣冒昧，略贅數語，以饗讀者。

百濟(公元前 18 年 -660 年)，又稱南扶餘，是古代朝鮮半島西南部的國家。532 年新羅兼併伽倻後，在朝鮮半島上形成了百濟與高句麗、新羅三足鼎立的局面，這段時間被歷史學家稱為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隋書》有載“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而根據韓國古代史料《三國史記》的記載，傳說百濟是高句麗創始者朱蒙的第三個兒子溫祚王於公元前 18 年在漢江南岸(今韓國河南省)創建的。在

百濟的鼎盛時期，其疆土涵括了包括朝鮮西部（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絕大部分，最北曾到平壤。百濟曾是海上的強國，通過海路與古代中國和日本各進行政治、貿易和文化往來。公元 660 年，百濟在新羅和唐朝的聯軍的攻勢下亡國而消亡。

據史料記載，在百濟枕流王元年（384），西域僧人摩羅難陀經東晉到百濟傳教，得到枕流王的優待，並於次年為其在漢山建佛寺。佛教從此傳入百濟並日漸興盛。《周書·百濟傳》曰：“（百濟）僧尼、寺塔甚多。”百濟僧人亦來華甚至遠去印度求法。南朝時期來陳國學習的百濟僧人玄光是中國和朝鮮半島天臺宗的先驅，南嶽門二十八弟子之一。百濟僧人謙益在武寧王末年（522）前往印度取經，百濟聖王四年（526）返回，後成為百濟律學鼻祖。

接受了中國佛教傳承的百濟亦將佛教傳入了日本。聖王三十年（552），百濟贈送日本金銅寺釋迦像、彌勒像、經卷等佛教用物，並告之“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從而把佛教進入日本。此後，百濟還曾多次派遣僧人去日本傳教。587 年，善信尼從日本來百濟學習戒律，後回國將戒律傳入日本。百濟武王二年（601），百濟僧人觀勒赴日本擔任僧正、檢校僧尼，是日本最早的僧官。

以上種種可以看到百濟佛教是佛教在東亞傳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是相對於新羅以及高句麗的佛教研究，受限於史料和考古資料的不足，百濟佛教的研究一直不溫不火。這本研究論集的出版，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了解韓國佛教研究的動態。

二、論文集目錄概要

漢城百濟博物館於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首爾舉辦了的主題為《百

濟的佛教受用與傳播》的學術會議，並於會後發行了相關的論文集。此次學術會議是在韓國的後新冠疫情時期舉行，所以同時採用了線上、線下的方式，旨在能讓更多的人了解百濟佛教的研究情況。

此次會議以“百濟與中國佛教”、“佛教對百濟社會的影響”、“百濟佛教寺院的發展以及與周邊國家的交流”三大主題為中心展開了論述，還針對了一直以來備受關注的百濟佛教的研究方向和焦點進行了探討。綜合討論則是從下午1點開始持續了近5個小時，討論的重點是學者和普通市民都關心的且能產生共鳴的部分，旨在讓一般讀者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學術界的研究現狀和局限。

本書的內容由〈主題發表〉、〈綜合討論〉1部、2部構成。

〈主題發表〉部分：收錄了三篇發表論文，分別是：

1. 百濟與中國的佛教交流 蘇鉉淑
2. 佛教對百濟社會產生的影響 吉基泰
3. 百濟佛教寺院的發展以及與周邊國家的交流 李炳鎬

〈綜合討論〉部分：

第一部分：有四篇相關評議文。

第二部分：針對百濟佛教研究中有爭議的部分，細分為14個小主題進行了探討和梳理。

第一部分：

1. 姜熺靜的點評文
2. 趙景徹的點評文
3. 周旻美的點評文

4. 趙景徹關於大通寺的附加討論

第二部分：

1. 百濟漢城時期的佛教受用背景
2. 百濟漢城時期佛教寺院的問題
3. 塔與佛教寺院的關係
4. 百濟漢城時期高層木建築與瓦當的使用問題
5. 百濟漢城時期的道琳
6. 百濟熊津時期大通寺的創建背景及其位置
7. 百濟塑像和器皿中釉的使用問題
8. 百濟熊津時期王宮的位置和大通寺
9. 大通寺的名稱與《三國遺事》中原宗弘法的記載問題
10. 百濟佛教中的高句麗因素
11. 關於百濟熊津時期謙益的記載
12. 扶余正林寺遺址石塔與益山彌勒寺遺址石塔的建立時間問題
13. 百濟佛教的南朝、北朝佛教之特點
14. 百濟佛教與東南亞

三、收錄論文概要

(一) 百濟與中國的佛教交流

德成女子大學的蘇鉉淑發表了《百濟與中國的佛教交流》一文。她利用佛像等美術史資料，分析了百濟漢城時期(384-475)、熊津時期(475-538)、泗泚時期(538-660)百濟接受佛教的情況。百濟從四世紀末開始接受了在印度誕生的佛教。六世紀以來，佛教是百濟國家

統治的重要思想基礎，無論是上層王公貴族，還是下層平民百姓，佛教在百濟人的生活中都發揮了深遠的影響。除高僧謙益的事跡之外，百濟大部分的佛教文化都來自於中國佛教。因此，要想了解百濟佛教，首先要對中國佛教有充分的理解。

在隋唐統一帝國成立之前，中國是多個王朝交替的分裂時代，朝鮮半島也是高句麗、百濟、新羅展開激烈角逐戰的三國鼎立時代。古代東亞佛教的政治性格很強，與皇權關係密切。特別是對朝鮮半島三國來說，佛教被認為是先進文化，被王權積極接受，三國時期的佛教文化因政治、外交而被接受，百濟佛教的對華交流也是如此。作為正式外交的一環，佛教被有意識的傳入。雖然也曾有過僧侶的民間交流，但百濟赴華留學僧的往來經常是與正式使節一起進行的。

百濟最初於公元 372 年向東晉派遣了使節，開始了首次對華交流，此後十多年後的枕流王元年(384) 從東晉接受了佛教。此後到六世紀前期，主要與中國南朝進行了密切的政治交流，在這一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傳入了南朝佛教文化。百濟在公元 553 年被新羅奪走了漢江流域，為了打破與高句麗及新羅的尖銳對立這一國內危機，百濟從六世紀後半期開始與北朝進行了積極的交流。可知南北朝佛教對於百濟佛教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到目前為止，對於百濟佛教文化的發展及其特點，進行過多次討論，並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發表者在她的文章中以百濟佛教研究中的爭論點為焦點，對百濟佛教在漢城、熊津、泗泚等三個時期進行了考察。

綜合可知，百濟的對華交流與中國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佛教文化的交流與對華外交的展開有很大關係。其中，受北朝文化影響較大的高句麗及其與道教的交流是以後在百濟佛教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應該考慮的元素。特別是有關漢城時期佛教文化的形成，筆者認為高句麗

的影響是需要進一步深入討論的部分。百濟佛教文化中的佛教雕塑涉及到百濟佛教美術的淵源及特性。這主要是在與中國南北朝文化的比較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對中國佛教雕塑的理解是必須的。但由於南朝和北朝遺物和遺跡眾多，從而導致了研究方向的傾斜，希望藉由最近新發現的百濟遺物帶來新的研究局面。七世紀以後，隋唐統一帝國的佛教文化傳入了百濟，對百濟佛教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過新的統一帝國的文化以何種方式與百濟現有的儀式結合，創造了七世紀百濟文化的內容在本發表文中沒有涉及。

(二) 佛教對百濟社會產生的影響

國家記錄院的吉基泰發表了《佛教對百濟社會的影響》一文。吉基泰的發表以土著山神信仰的關係和法華信仰等問題為中心，考察了百濟社會中佛教思想所帶來的影響。

在佛教接受之前的古代社會，國王或貴族在天神或祖先中尋找他們的身份正統性。將自己的祖譜連接到天神或祖先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王權的正統性藉助天神的威德，得到了民間對其權威的認可。隨著佛教的普及，百濟社會在很多方面發生了變化，這可以從很多方面得到了驗證。比如說輪回轉世改變了人們對日常生活的認識。此外，信仰的多樣性以及在佛教教學的發展過程中追求高層次的思考也在這些影響當中。特別是，佛教作為整個社會的中心意識形態，對重要政策的決定和方向性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以說，佛教所帶來的多方向的變化影響到了百濟社會的每個個體，人們的思考被規範在佛教這個框架之中。

為了觀察這一過程，發表者認為首先要解讀百濟漢城時期佛教的內容。他主張通過格義佛教了解佛教，同時也要關注到隨著佛教祈福

的逐漸普及，業力說是如何被大眾所接受的。接下來，還需要觀察被認為是百濟佛教得以開展的基礎——度僧與佛法。此外，對熊津時期佛教中占據第一位的謙益相關記錄的可靠性的探討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因為有關謙益的記錄只出現在 1918 年李能和編纂的《朝鮮佛教通史》中。沒有其他史料可以證明該資料的可靠性，因此就其是否是偽史料出現過很多的爭論。

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被認為是七世紀編撰的《大乘四論玄義記》對當時的三論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對編撰這部義記的慧均是否是百濟人的歸屬問題進行了推論。在考察這一過程的同時，也一起思考百濟佛教教學是如何展開的。最後，通過山神信仰來了解百濟佛教與土著信仰的交涉，及其與土著信仰的融合過程。

(三) 百濟佛教寺院的發展以及與周邊國家的交流

公州教育大學的李炳鎬的論文，不僅對扶余正林寺遺址和益山彌勒寺遺址等廣為人知的百濟佛教寺院的編年以及石塔的建立年代等爭論點進行了考察，還對傳播到日本等地的佛教寺院進行了多角度的思考。

隨著佛像、經傳、僧侶等代表佛教的三寶都被傳入百濟，佛教在百濟社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佛教並不單純靠經典的傳播或僧侶的出現來維持，而是還有僧侶們居住並且進行各種儀式的場所——寺院。對於百濟來說，隨著佛教的傳入而建立的佛教寺院，是一種在建築土木、雕刻工藝等諸多方面的新型技術體系。

說起百濟佛教史，很容易想起佛教思想的發展歷程，但要想完整地理解這一過程，就必須要考察佛教寺院的發展歷史。對佛教寺院的研究，除了既有的文獻研究外，還應該進行以寺院遺址發掘中發現

的文物、遺物為基礎的考古學、美術史、建築史等方面的綜合性研究。相關寺院的選址或分布、伽藍布局、建築用地、瓦器陶器、佛像工藝品、出土文字等，還有必要與其他地方或其他國家的出土文物進行比較。

出現在印度的佛教，經由中國的演化繼而再次延伸到朝鮮半島，這種以佛教為媒介的文化傳播不是單純的物質轉移，而是包括了人類文明信息轉移在內的相互互惠的因果關係。這篇文章是為了了解百濟接受佛教後，佛教寺院的發展和變遷過程，以及它與高句麗、新羅、日本等周邊國家有著怎樣的聯系。文中介紹了從百濟漢城時期，到熊津時期、泗泚時期的主要佛教寺院遺址以及最近的百濟考古發掘成果，並通過相關的研究討論了百濟寺院的成立和展開的過程。另一方面，還對百濟寺院與周邊國家寺院的交流問題進行了探討，把在高句麗、新羅、日本等寺院中出現並可以確認的文物與百濟佛教文物進行橫向的比較。

四、簡短的評價：百濟佛教研究的啟示和思考

百濟是佛教文化繁榮發展的國家，考察百濟史就無法擺脫佛教而思考。可惜的是，在韓國的百濟史研究方面，相關的佛教史料並不豐富。雖然百濟熊津時期以後各種形態的佛教資料藉助考古發掘的成果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但在查明歷史中的百濟佛教的發展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局限。《百濟的佛教受用與傳播》利用有限的史料，講述了歷史中的百濟佛教。特別從佛教美術史、思想史、考古學的角度對百濟佛教的發展情況進行了探討，擴大了百濟佛教史的研究範圍。在這方面，這些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現在能找到的百濟佛教史相關資料大多比較零散，因此很難完成

其框架的構建。而從佛經等資料中尋找歷史的小碎片，利用它們重新拼湊出歷史的原貌，是史料短缺的百濟佛教史研究中的一種有效的研究方法。不過這種研究方法隱含着一些風險，稍有不慎就會喪失歷史性。因此，這樣的歷史研究需要更嚴格的驗證過程。

百濟時代諸多大乘經論，如《法華經》、《涅槃經》、《金光明經》、《成實論》、《三論》等非常流行，但是對這些經典經論及其相關思想在當時是怎樣的一種傳播和流通方面仍然是一片空白，很難掌握那個時代佛經教義的發展情況。究其原因，是因為相關資料的短缺而導致的學術研究之不足所致，所以留有許多遺憾。從這一點來看，今後的百濟佛教研究課題任重而道遠。

此外，像憬興這樣出生在百濟，後前往新羅的僧人也是一個突破的方向。對這些僧人的研究有助於理解百濟後期佛教的信仰和思想的傳播和發展，自然需要把百濟佛教與新羅佛教之間的關聯和影響也考慮在內。另外，對於未盡的研究部分，應該積極利用考古學及美術史的研究成果，把它們與百濟佛教相連接，為今後的百濟佛教相關研究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